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富 在 民

费孝通◎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志在富民

费孝通◎著

刘豪兴◎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志在富民/费孝通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ISBN 7-208-05415-0

I. 志… II. 费… III. 农村经济-经济发展-考察报告-中国 IV. F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8327 号

责任编辑 陆宗寅
特约编辑 吴星才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志在富民

费孝通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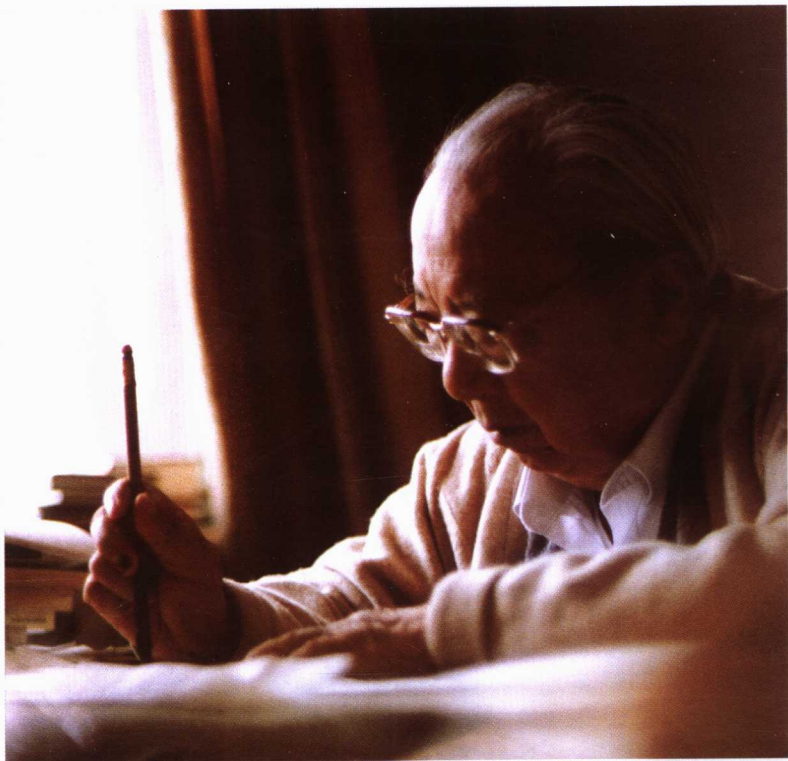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1.25 插页 6 字数 490,000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5415-0/C·188

定价 48.00 元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县城。1920年入振华女校（今苏州第十中学）。1928年夏天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高中，秋天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秋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工作。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1980—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人类学教授。作为社会活动家，曾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1980年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在联合国接受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奖；1994年接受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

总 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 2002 年推出了中国乡村考察报告的首本著作《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刘豪兴等著),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认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是一个好的选题,进而计划组织出版“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社会学等学科发展的需要,是一件好事,我积极支持和参与。

我坚持把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动力,但从哪里入手呢?我是从农村入手的,并一直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为社区研究的主体。我重视并坚持农村研究有主客观的多种原因,但主要的一个是由农村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到了 21 世纪中叶,城市化水平达到 70%,16 亿人口中仍将有近 5 亿人口在农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农业和农村即“三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要强盛,首先要使农村不断有大的变化,农民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植根于农村这个乡土社会。这是中国的国情。因此,我认为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农村社会,认识农村经济,认识农民生活及其人生态度。只有认识农村社会,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也只有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出发,才能科学地处理和解决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开始,我一直把研究农村作为己任,并为之奋斗了近 70 年。但是,我还不能说,我已认识中国社会了,我只是向认识中国社会这个目标接近了一步。我这一辈子是在不断提出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有所认识、有所发现,继而又在新的破题和调查中走过来的。认识无穷尽,脚步永不停。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迁,对社会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已有知识的水平上。认识中国农村社会,

需要数代人不懈的努力,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国乡村考察报告”的陆续出版,有系统地把分散的、孤立的、不同类型的社区研究集中起来,将为比较研究,逐步接近认识农村社会、认识中国社会提供有益的帮助。

认识社会是为了改造社会,农村研究也就是为探讨农村发展的道路,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尽一点力。为研究而研究,有损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对社会毫无补益。急功近利,浮于现象,没有周密的、系统的、深入的考察和科学的分析,也难以提出有效改造社会的意见。1938年秋,我校对完《江村经济》(又名《中国农民的生活》)样稿后回国,辗转从英国回到抗战的后方——云南昆明,两个星期后我就一头钻进内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了。我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学术群体在短短的几年中进行了多项调查、撰写了《禄村农田》(费孝通著)、《易村手工业》(张之毅著)、《玉村农业和商业》(张之毅著)、《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著)、《内地女工》(田汝康著)、《昆厂劳工》(史国衡著)等多种报告。我在综合比较分析不同类型的农村研究,写出了《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等理论著作。当年的环境条件很差,困难很多,但我们有一股劲,一股追求知识的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股劲呢?我们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们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有责任,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我希望“中国乡村考察报告”的每一本书都尽可能有明确的意图,既可为认识中国社会和学科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和观点,又能为现实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农村研究应有一定的范围,也就是要有清楚的研究单位。这个研究单位的选择因人、因地、因时、因财力而定。可以是一个村庄,或一个乡镇,也可以是一个县(市),或一个经济开发区。范围小些,便于操作,范围大些,难度大,但说服力可能强些。中国乡村考察宜以村庄和乡镇为主,应有不同的类型。根据研究的需要和可行性,一个研究对象可以

是比较全面的考察,如《江村经济》是对开弦弓村这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及其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体系比较全面的描述。也可以是突出某个主题的深入考察,如我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和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分别以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活动和摆夷(即傣族 Tai)宗教活动等为研究对象,各有侧重的主题。

农村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我经常采用并极力主张的是实地调查方法。实地调查又称田野调查,是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者直接深入社会、亲自观察人们的实际生活,通过不同形式的深度访谈获取研究资料。这样得到的资料一般是比较客观的、可靠的,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就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可以说,实地调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从实求知,我学术活动的起点是实地调查,我学术道路的各个进程都伴随着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是我学术研究的基石。1978年,我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坚持的仍然是实地调查。“行行重行行”,我对自己调查过的地方只要有条件,我都重新回访,不止一二次,可以是多次,江村我已是访问了26次。1984年9月,我第一次访问“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结下了不解情结,今年8月底我前往进行了第六次访问,看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穷则思变,探索了一条以退耕还林为契机,发展生态经济治贫致富的路子。“故地重游”,我对调查过的地方的每一次重访都有新的认识。这种研究被称为追踪研究,也就是研究者本人或其他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同一社区或同一现象进行研究,从不同阶段的比较中深化认识。我紧紧追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一边调查,一边记录,提出了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边区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等主张,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尽了一点力。理论联系实际,实地调查要有理论指导,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要进行理论概括,才能获得对社会规律性的认识。问卷调查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我赞同适当地采用,但如果没有实地调查相佐,单一的问卷调查难免会发生认识上的偏差,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怎样相结合,我们的经验还不多,值得很好研究。

1979年春天,我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已基本确立。社会学对社会现实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决策咨询提供了一批有益的意见。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应当肯定。自然,我们也自觉地意识到,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在中国历经坎坷,先天不足,后继乏人,还有不少问题和困难。我国社会学远未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如能上阵真正认识中国社会并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人还很少。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仍应是第一位的,但不能关在书堆里、爬在网上培养,应当在实地调查的广阔天地里塑造。“中国乡村考察报告”可以为社会学专业人才的成长提供一个舞台,坚持数年必有成效。丛书的出版可以打破常规,条件成熟可以同时出几本,也可以成熟一本出一本,要努力适时地反映不断变化的农村实际,提高考察报告的水平。

我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把认识中国社会的好经验、好传统传授给下一辈。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对中国社会学事业充满信心,盛世将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乡村将更加繁荣,祖国将更加昌盛,农民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2003年12月5日

志在富民

(代序)

我是1980年恢复工作,当时已经70岁了,我想这辈子所剩的时间不太多了,我讲过一句通俗的话:我身边只有10块钱了,这10块钱得好好花,不能零零碎碎的花掉,时间要用得集中一点。这10年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还是从我过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几个问题。30年代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提出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这样一个题目。这是个很大又空洞的题目,怎么下手呢?我想要了解有着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人口的中国,必须从基本入手,那就是从人口最多的农民入手。中国自古是以农业立国,当时的4万万人口中,百分之八九十都住在农村,所以我说要了解中国必须从了解农民开始,1936年我就开始在农村调查,这就是我走出的第一步,也就是我的基础。

我历来主张实地调查,不能单靠书本。要到农村里去看中国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什么问题。我是从家乡江苏吴江开始的。那里在太湖边上,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花了一个暑假,在一个村子里做了实地调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蹲点”。因为是家乡,所以对地方和人都比较熟悉,在村子里同农民谈,观察和了解他们的生活。后来我把这些材料写成了书,叫《江村经济》,这是50年前的作品。我在农村里看到了什么呢?书里最后一章说了,是饥饿问题,农民没有吃饱肚子。饥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封建剥削,农民生产的一半被地主剥削去了,同时这地方人多地少,那个时候人均已经不到1亩地了,虽然这里的土地肥沃,向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应当是可以让人们吃饱的,但是严重的封建剥削,使这里的人基本上成了佃户。为了能够活下去,在漫长的时间里农民

们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搞手工业,搞副业。我在结论里说:这个地方在封建剥削之下,老百姓处在饥饿状态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同时发展当地的手工业、副业生产,工农相辅。这个结论是从实际观察中得出来的,不是照书本抄的。经过了50年,现在再来看,这话基本还是符合实际的。

后来发生抗战,我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书。在云南又去调查了三个村子,写了本书叫《云南三村》。里面写了抗战时期内地农村的情况。在《云南三村》里我提出:中国农村要单靠农业生产的收入是绝对不够的,要想富起来,必须进行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就是要将农村里的劳动力尽可能地转化为生产力。凡是发展了副业、手工业的村子,农民生活就比较好一点,相反不发展的地方,农民生活就差,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当然,在解放前更重要的是一个阶级问题、剥削问题,那时候也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是讲得不透,我们提出的土地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阶级问题,封建剥削的问题。

解放后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少数民族问题上。1957年有机会又回家乡,看到解放后的中国农村起了很大变化,饥饿问题解决了,农民能够吃饱肚子,但是他们反映手头没有钱。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看更清楚了,就是商品经济没有得到发展,钱就是商品交换嘛!我把这个意思写在《重访江村》里。我的话与当时的政策相违背了,那时强调农业单一生产粮食,以粮为纲,不准许农民搞副业生产。我一贯的想法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路子就是农村要办工业,发展副业。现在回想起来,这条路子的确与当时的政策不符合,所以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这之后,我就没有机会再下乡搞调查,直到1980年才重新恢复活动。

1981年我又回到曾经调查过的村子,这是第三次访问。从初访、重访到三访,今年已经是第15次去那里了。通过反复观察,我看到这10年中国农村的确发生了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大变化,农民富起来了。1981年我三访江村时,村里的人均纯收入是每年20元,今年春天已经增长到每年200元,整整增加了十倍!我要看看这个村子是怎么变的,怎么富起来的?看来最基本的一条:单靠土地来增加收入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对土地的投入多,产出却很少,这叫“边际效益”递减。

农民要在农业之外，找到一个把劳动力变成生产力的办法，创造出财富，那么农民就能很快富裕起来。我 50 年前讲的“工农相辅”就是农民利用劳动力的一个传统办法，在我的家乡就是搞各种副业：养蚕、缫丝、织绸，这是一种方式。

过去在农村里，由于不能充分地利用农村的劳动力，除了生产粮食之外，不允许农民搞其他生产，到了“文革”时期，连老太太拿几个鸡蛋去卖，都被说成资本主义萌芽！这样商品经济在农村不存在了，农民手里当然没有钱花。同时，大量的劳动力浪费掉了。我们估计用 $1/3$ 的劳动力，就可以经营好所有的土地，也就是说 $2/3$ 的劳动力浪费了。表现出来就是吃“大锅饭”，锅里的饭又不增加。于是，队里的工分值越来越低。到了“文革”后期，政策有点放松，允许在农村搞农机修配厂，于是在这块牌子下面，偷偷地办起各种各样的工厂，社队工业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候碰到一个历史的机遇，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城市里的工厂停产闹革命，不生产了，但是社会上的需求并没有降低，特别是外贸还要继续维持下去。江苏一带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工厂下乡”。乡下正好在寻找赚钱的机会，两边结合起来，工农相辅，出现了社队工业。后来公社改成乡，生产队改成村，社队工业的名称改成了“乡村工业”，最后又改成“乡镇企业”，现在大家都用这个名字了。

乡镇企业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公社制度还没有解体之前，也就是我们的基层经济单位还是生产队、大队、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在公社制度的体系里，建立了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实体，所以说乡镇工业是集体性质的，不是个体经营的。后来农业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以家庭为基础，家庭成了经济实体。然而在公社解体之前已经出现的大批公社所有的、生产队所有的工厂是不能分的，因此被保留了下来，这样保留下来的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工业与包产到户的农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所讲的“双层结构”。这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搞工业需要资金，要有启动力。公社时期集体积累的资金，成了办工业的启动资金。工业产生的利润比农业大，除了必要的开支之外，大部分利润可以留在工厂里，滚动发展，所以才有了现在乡镇企业这样的局面。1984 年以后，中央有了明确的政策，承认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一个

支柱,从此全国农村出现了大办乡镇企业的高潮。这10年来乡镇企业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1989年统计,全国乡镇企业生产的价值达到9000亿元,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且国家没有为此花一分钱,都是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现在江苏农民的收入,农业收入只占20%左右,其他都靠工业生产收入。那里的乡镇企业,从大家凑钱办小厂,逐步发展到国家二级企业的标准,产值上亿元。我最近回去,参观了一个在偏僻的河塘里的小村子,由四位复员军人办了个厂,经过5年的奋斗,现在产值有一个亿。这里的乡镇企业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例如日本人喜欢用“榻榻米”,苏州就有人从日本引进席草,大批生产“榻榻米”,向日本出口,生意做得很大。吴江县盛泽镇,生产丝绸和服装,原料都来自农村,现在这个5万人的小镇,年产值达到17亿元。我写了一篇文章《吴江行》,想通过解剖一只麻雀,来说明这个地方是怎样从温饱型经济达到小康经济的,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我们的国家到本世纪末,除了少数特殊条件的地区之外,都要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我们的任务。但是怎样才能达到小康呢?各个地方都要找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子。每个地方情况、条件不一样,不能把别人的办法机械地搬来,我是把家乡走的路子总结出来,提供大家参考。

我看到家乡的农民富起来了,很高兴,同时希望全国的农民都能富起来。我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到各个地方走的路子不同,各有特色,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先到了温州,这是个小地方,很穷。当我们和台湾关系紧张的时候,这里是个准备打仗的地方,所以国家不投资办工业;农业也不行,人均不到半亩地。怎么生活呢?解放前他们往国外跑,漂洋过海到国外去做小生意,当时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有大批的温州人,也就是青田人。他们在外边开商店、饭馆,赚了钱寄回国养家,在家乡买房子,还要准备一个坟,温州的坟是最漂亮的,他们这一辈子就为了阴阳两个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温州人有这么个传统,按现在的说法叫“劳务输出”。

解放后外国不容易去了,他们就在国内跑,80年代政策一放松,大家都看见了,全国到处有浙江人。我在内蒙古伊克昭盟、赤峰,在很小的镇上都看到有浙江人开的成衣铺和修鞋的。在北京有一个时期家具

很难买，就有一批浙江人来了，他们到家里替人们修理家具，做床、做桌子，他们的工资很便宜，这些人住在地震棚里，生活很艰苦，但是一年可以赚几千块钱。后来我们的政策允许长途贩运，这批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浙江人，把小商品带回家乡，很快在温州建立起一个小商品的大市场。1986年初，我去参观了桥头的纽扣市场，这里原来是个山沟里的小村子，现在家家户户制作纽扣，同时全国各地的纽扣厂也来这里做生意，形成了一个纽扣大市场。几乎所有的纽扣，不论什么花色、什么型号这里都有，只要客户写封信，他们马上寄去，服务网发展到南洋、香港。还有其他小商品的市场，只要家庭能生产的商品，这里都有。现在这个小村子面貌焕然一新，新房子盖起来了，一般是四层楼，下面开店，二层办厂，三层住人，四层是仓库，老百姓生活一下子提高了。我写的《小商品 大市场》介绍了温州的经验。

我在延边听说这里的人不大愿意做这类小事情，结果一个很大的市场让给了别人。我们知道农村办工业，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靠农业很难积累资金，但是农村劳动力很多，可以到外边去赚呀！英国的工业化资金哪里来的？他们是靠海盗抢。日本工业的突起是靠我们的赔款，是中国农民给的钱，培养了他们的工业。我们中国不能走这样的道路，我们要靠农民的积累，中国的农民省吃俭用，做出了巨大贡献，积累的资金办起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农民的血汗造出来的！去年我们工业滑坡，但最终统计工业还是增长了。靠的什么？就是靠乡镇企业的增长。乡镇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向农业投资，在基层工农是一家，分不开的。这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工农相辅”。我们常讲的“牛郎织女”，就是象征着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农民要富起来，重要的是要使农民直接参与到工业生产中去，这就是乡镇企业。

再向南看，现在乡镇企业的性质变化很大。福建出现了大批利用侨资办的厂。这两三年来，印尼、泰国、南洋的一些比较有钱的华侨，大规模的、大批的到家乡来办厂，他们带来机器和技术，很快就发展起来了。还有广大的台胞，他们与大陆是相通的，是一家人。我们的政策一放开，福建第一个得到好处。去年我去访问，写了一篇《侨乡行》，把华侨从寄钱回来养家，发展到回家乡办工厂的过程写出来了。

广州的情况又与福建不一样,那里是香港同胞回来办厂,但是铺面还在香港,而厂房开在广州,他们在外边接头订货、买原料定样品,把制造过程搬到广州,这是因为广州的劳动力便宜,能够降低成本。珠江三角洲的做法是先建设开发区,辟出一块地方,投资建造了厂房,修通马路,接通水、电、电话,完善了投资环境,然后请香港老板来租用,我们出劳动力。这样在这10年里,我国沿海地区得到了发展,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近几年我又想到,中国的内地,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怎么发展呢?现在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当前很大的问题。我们允许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可是不能差距太大。换句话说,如何使内地的农村,特别是边区的农村赶快富裕起来,这是我1985年以后提出来研究的题目。为此我从兴安岭呼伦贝尔开始到阿拉善,差不多横穿了整个内蒙古,又到了最穷的甘肃定西,宁夏海固,反复多次去看,去学习,想找出一条发展这些地方经济的路子。我认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如果不尽快发展起来,将会出现很大的贫富差距,这个后果将会是相当严重的。目前我们国家没有发生像欧洲某些国家发生的民族问题,因为我们与他们的情况不同,政策也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尽快发展起来,就可能出现各种表现形式的民族问题。我在“文革”时编写过《民族问题资料摘译》,看了不少有关资料,他们的主要问题就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维持民族大团结不能仅仅靠感情,要靠物质基础。我们的情况好一点,国家背着,国家在西藏投了很多钱,但根本的要靠各民族共同繁荣。所以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提出,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要共同繁荣,要先富帮后富,先进帮后进。问题是怎么帮法,不是救济,不是国家补贴,而是要发展当地的经济,自力更生,自己能够站起来。这是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这条路的话,后患无穷!

民盟在这方面也出了力。我们建议黄河上游的甘、宁、青和内蒙古四个省、区,团结合作,一同开发利用黄河上游丰富的水利资源和矿产资源,一方面能够支持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同时也能发展自己的地方经济。另外还可以向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国际贸易。我们提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这些意见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在浦

东开发区成立之前，我们提出了一个以上海为龙头，以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设想，希望把上海建成一个大陆的香港，社会主义的香港。香港怎么会一下子繁荣起来的？30年代它还是一个充满鱼腥味、满街木屐声的小地方。大陆解放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香港成了惟一的对外窗口，这样它就成了一个经济、贸易、技术、金融、信息的中心。现在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是靠了香港的扩散，但是赚钱还是香港拿了大头。不能长期这样下去，我们要在原来的东亚第二大港上海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香港！我们最近又去了四川，看来西南的前景是很好的。现在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起来了，我们要在西南开个门，打通一条路。其实历史上早就有这条路了，叫“南方丝绸之路”，比西面从长安经甘肃河西走廊，出新疆的这条路还要早。《史记》里记载着张骞出使西域到了大夏，就是现在的阿富汗，见到了“蜀布”，吃到了四川的酱，阿富汗人说，这些东西是从印度来的，很显然印度同我们有着一条通道，这条路是从成都，经大小凉山、西昌、攀枝花过大理、腾冲到德宏出去。据我看北面可能还有一条路。现在有成昆铁路、滇缅公路通出去，总之我们要在西南找出一条通往国外的道路。四川的很多革命老前辈也提出了这个意见。我们准备整理一份材料，向中央提出建议。

我们的东北怎样呢？东北的南部是辽宁省，有出海的口岸，但吉林省一直没打通出日本海的道路。这是由于历史上不平等条约造成的。那时帝俄的用心恶毒，在图们江15公里的地方切断了出海口，使吉林成了内陆省，但是根据条约我们还有通过图们江出海航行的权利，当时就有老百姓出海捕鱼，也有船从珲春到上海、大连。一直到1938年，日本同苏联发生了“张鼓峰战役”，日本打了败仗，因为怕苏联利用这个口岸，所以封锁了，到现在已经52年。但是我们在图们江的航行权并没有丢。最近吉林、延边的同志提出，日本强行封锁海口，在法律上讲是无效的，我们要重新利用行使图们江的通航权，建立一个出海的口岸。去年我们已经派船，挂上五星红旗，从防川到日本海跑了一趟，我们希望能继续跑下去，逐步把珲春建成一个出海口岸，这对东北的经济发展将是一个推动。

我说这些是什么目的呢？目的是说明，我们要有一个宏观的看法，在 21 世纪，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如何全盘安排，眼光不能太小，要扩大一些，要联系到整个世界的变化来部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民盟提出来的做好事、做实事，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而言的。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这个总的方针之下，我们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动脑筋，想办法，同共产党合作，一道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参政党，就要行使这个权利，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出力量。

作为民盟成员，我们要用知识推动社会前进。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这四句话是有实际内容的，是做人的道理。对国家为人民有好处的事，每个人都做，就能够起大作用，大作用要从小事做起。

1991 年 7 月 18 日

目 录

总序·····	1
志在富民(代序)·····	1
三访江村·····	1
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 ·····	18
小城镇 大问题 ·····	25
小城镇 再探索 ·····	62
小城镇 苏北初探 ·····	79
小城镇 新开拓·····	109
赤峰篇·····	135
包头篇·····	160
定西篇·····	175
九访江村·····	191
小商品 大市场·····	210
临夏行·····	226
苏南行·····	236
海东行·····	247
全国一盘棋 ——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	254
南岭行·····	262
四年思路回顾·····	270